

《中國評論》與19世紀末英國漢學之發展

China Review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in England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王國強 (Wang Guo-qiang) *

《中國評論》(原刊名為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是晚清時期一份出版於香港的英文期刊。對於《中國評論》的專門研究，目前為止還十分有限。就筆者所見，僅有香港浸會大學黃文江的“Hong Kong and Sino-Western Cultural interaction: Ernest John Eitel and the China Review”一文，¹重點論述 E. J. Eitel (一般譯為艾德或歐德理) 與《中國評論》的關係，對該刊的基本情況也有大致介紹。但由於缺乏較為直接的檔案材料，全面而準確地認識這一刊物還存在不少障礙，這裏筆者在前人論述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研究所得，考述該刊的幾個基本史實並論證其對於英國漢學發展的貢獻。

一、《中國評論》創立的背景： 西方文化在香港的傳播和發展

1842 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將香港割讓給英國。此後，以英國為首的西方人開始不斷地移民香港，到 1860 年，香港的人口「已達 94,917 人，約為 1851 年的 1.9 倍」，也就是在這一年「英國割佔九龍，該地居民 5,105 人『人隨地歸』，悉數計入香港人口範圍。」² 此後香港

的人口也保持了不斷增長的勢頭。³

香港人口中的非華裔人口主要是來自歐美國家的移民，以 1897 年為例，在非華裔人口的 13,700 人中，歐美人有「5,532 人，在總人口中約佔 2%，與華人口約成 1 與 50 之比。」⁴ 單從人口數量上看，歐洲人處於明顯的少數，但是他們控制了香港的政治和經濟命脈，在文化活動中也扮演著十分活躍的角色，地位和影響都是十分重要的。

隨西方移民蜂擁而至的還有西方的文化和科學技術，大到政治制度、思維方式，小到日用器皿、建築樣式，可謂不一而足。應該說，名為 Review (評論) 的定期出版物，也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英國文化的組成部分。英國「在 18 世紀，『雜誌』這種刊物已經完全建立起來。到了 19 世紀，出現了一種新的刊物，這就是『評論』。」⁵ 「19 世紀的英國評論開始於兩個雜誌，一個是《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發刊於 1802 年，一個是《每季評論》(*Quarterly Review*)，發刊於 7 年之後，是反抗前者的」，這「在文學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史實。」⁶ 「評論」與「雜誌」的區別在於「它用論文的形式提出一定的觀點，其內容就是評論文章開頭所指明的那些書籍，通過這種手段達到對讀者進行教育或者說服的目的。」⁷

* 作者為歷史學博士，現任洛陽師範學院歷史系講師。

1 見《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0)，頁 119-147。

2 余繩武、劉存寬，《19 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4)，頁 339。

3 參考「1862 至 1901 年間香港人口的統計」，見“Appendices V. Population of Hong Kong 1862-1919,” see G. R. Sayer, *Hong Kong 1862-1919 Years of Discre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38-139.

4 《19 世紀的香港》，頁 354。

5 喬治·桑普森著、劉玉麟譯，《簡明劍橋英國文學史·19 世紀部分》(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7)，頁 45。

6 鄭振鐸，《文學大綱·下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頁 264。

7 同上註。

當然，「評論」這種刊物在香港的產生除了自身的歷史淵源以外，還有其得以運轉的種種文化和物質基礎，而西方文化在香港的傳播和發展正是建立這些基礎的必要條件。以下筆者僅就交通和運輸、教育事業、印刷和出版等三個方面來做些探討。

60 和 70 年代是香港航運業的重要發展時期，其網路覆蓋區域已經遠至歐洲大陸、日本和新興的英語世界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地。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香港的航線有「歐洲線、北美線、南洋線、澳洲線、印度線、菲律賓線、新加坡線、海防線、曼谷線、日本線等。」⁸ 已經成為連接東西方的「神經中樞」。

來港的歐美移民中有很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人士，他們傳播西方文化的方式很多，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源自西方的新式教育。英國侵佔香港後，馬禮遜教育會認為「香港英國居留地為擴大本會活動計畫提供了特別合適的機會，只有在該地才能為本會順利實現自己的意圖提供保護和餘地」，⁹ 故而將原在澳門的馬禮遜英華書院遷至香港。之後不久，原在麻六甲的英華書院也將其校址移到香港，使其於「1843 年成為香港的一所神學院」。¹⁰ 此後，各類學校相繼建立，伴隨著港府對教育投入和管理的增加，在 60 年代「港府從教會手中獲得了對公共教育的控制權」，¹¹ 使香港的教育走上了更加正規的道路。到 1873 年，香港有「30 所官立學校，6 所接受政府補助的學校，合計 36 所。1900 年則有 13 所官立學校，97 所接受政府補助的學校，合計 110 所。」¹²

近代西方的印刷術傳入中國與新教傳教士東來有著很大的關係，早在 1814 年，馬禮遜（R. Morrison）就希

望「倫敦傳教會能夠募足經費，差派印刷技工到麻六甲來建立印刷所，以便印製中文、馬來文和英文的傳教用品。」¹³ 至 1818 年時，馬禮遜已「開辦了兩處印刷所，出版了大量的書刊」。¹⁴ 倫敦會遷港之後，又將這種印刷技術和相關設備引入到香港，據理雅各（J. Legge）稱，位於荷裏活（Hollywood）道的一所房屋「多年來一直是倫敦會的印刷所」。¹⁵ 宗教性的印刷所之外，還有不少其他的印刷和出版機構，如「德臣印字館」（‘China Mail’ Office）和後來建立的別發洋行（Kelly and Walsh Ltd.）香港分部等。

這三點都是《中國評論》得以產生的基礎條件。便利的交通使該刊能夠連接其在於中國沿海口岸、歐洲大陸和新興英語世界的撰稿人和讀者群體，使得其地理範圍廣闊的銷售管道可以正常運轉；而教育的開展則擴大了知識階層的人數，為其在本港培養出大量潛在和現實的讀者、通信者和撰稿人；當然，現代印刷術的東傳和出版機構的出現又為其出版發行提供了最基本的技術支援。而所有這些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結果而出現在香港的新事物，正是《中國評論》產生的基本條件。

二、《中國評論》簡介

就筆者所知，目前相關論述關於《中國評論》的略稱和譯名頗為不一，大致如下表所示。

總而論之，以 *CRNQ* 作為英文略稱較為合適，因為它避免了該刊與其他以“China Review”命名的刊物之間的混淆，具有獨一無二性；而以《中國評論》作為中

8 同上註，頁 202。

9 E. J. Eitel,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see *CRNQ* 19:5 (1891): 310. 此處 *CRNQ* 為 *China Review* 的簡稱，下同。具體可參本文第二部分的相關討論。

10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in Malacca, 1818-187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13.

11 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Develop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44.

12 《19 世紀的香港》，頁 315。

13 馬禮遜夫人編、顧長聲譯，《馬禮遜回憶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 101。

14 同上註，頁 136。

15 J. Legge,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see *CRNQ* 1: 3 (1872): 166.

表：相關著述對China Review的略稱和譯名一覽

略稱	中譯名	出處	出版時間
China Rev *		Henri Cordier, <i>Bibliotheca sinica</i>	1902-24
	中國評論	貝德士, 《西方東方學報論文舉要》	1933
Ch. Rev.		石田千之助, 《歐米に於ける支那の研究》	1943
CRNQ		Martha Davidson, <i>A List of Published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i>	1952
CR		李約瑟, 《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	1975
	中國評論	賈靜濤, 《中國古代法醫學史》	1984
	中國雜誌	伯希和, 《鄭和下西洋考 交廣印度兩道考》(中譯本)	2003
CRNQ	中國書評	陳才智, 《西文漢學研究期刊一覽》**	2006

* 或Chin. Review, 原書寫法不統一。

**http://www.cass.net.cn/chinese/s15_wxs/Article.asp?ID=1498, 2006年1月15日。

譯名較為常見, 其餘「雜誌」和「書評」的譯法均與該刊的內容和精神不符。筆者在本文中所採用的也是這兩個標準。

筆者所見關於《中國評論》的相關論述中, 錯漏之處頗多。以下筆者就其「前身」、出版的地點和時間、編輯、作者群、發行管道、欄目設置和主要內容等方面來逐一探討, 順帶指出相關著述的不確之處。

(一)《中國評論》的前身

在《中國評論》的開篇〈導言〉中, 編者指出「要瞭解《中國評論》出版的目標, 就必須注意到人們對有關中國和遠東這個知識寶庫的興趣不斷增長的願望。《中日釋疑》(*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一份在中國和歐洲都頗受歡迎的刊物在出版四年後不幸停刊了。原因就在於前任主編因工作關係返回歐洲, 而其繼任者出於未知的原因而未能繼續。《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 另一份目標相近但更多地關注傳教士讀者的刊物, 也停刊了, 它的復刊看起來也成了一個未決的問題。」¹⁶「在有些方面它可以說是上述兩份刊

物雜誌的繼承者」。¹⁷雖然《中國評論》的編輯同時以《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的繼承者自居, 認為「《中國評論》是《中國叢報》這份曾經著名而至今仍讚譽頗多的刊物的合格繼承者」,¹⁸並在開篇〈導言〉中宣稱「要在版面允許的情況下重印發表在《中國叢報》上的優美文章」。¹⁹

但這只是表面現象。事實上, 《中國評論》對於《中國叢報》, 僅僅是一種精神上的繼承而已, 通觀《中國評論》全卷, 根本沒有重印一篇發表在《中國叢報》上的文章。

而《教務雜誌》明顯的是一份宗教性的刊物, 與《中國評論》作為專業漢學刊物的性質相差甚遠, 並且《教務雜誌》於1874年在上海復刊並一直發行到1941年方告結束。

倒是《中日釋疑》和《中國評論》, 無論在內容、形式和人事方面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是《中國評論》真正「前身」。兩者的承繼關係可由下列情況看出: 它們的創始人都是鄧尼斯(N. B. Dennys), 這兩份刊物都與《德臣報》(*China Mail*)關係密切, 作者群也大體

16 "Introductory," *CRNQ* 1: 1 (1872): 1.

17 M.G. 馬森著、楊德山等譯, 《西方的中華帝國觀》(北京: 時事出版社, 1999), 頁71。

18 "Editorial Announcement," *CRNQ* 22: 4 (1897): 620.

19 同註17。

相同；²⁰從雜誌的形式來看，《中國評論》繼承了前者「釋疑（Notes and Queries）」的基本形式，只不過增加了長篇的論文和「學界消息」（Notes of New Books and Literary Intelligence）兩個欄目而已；在內容上，兩者都以中國的歷史、語言和文化為主要的探討對象，並兼及日本和朝鮮。

（二）《中國評論》的出版地點和時間

石田干之助在《歐米に於ける支那の研究》中明確指出：「《中國評論》、《支那民俗志》（*Folk-lore of China and Its Affinities with that of the Aryan and Semitic Races 1876*）一書的作者鄧尼斯氏 1872 年 7 月在香港創刊的隔月發行的通俗學術刊物，由氏所經營的《德臣報》（*China Mail*）社發行。後由所謂《梵漢字典》（*H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 being a Sanskrit-Chinese Dictionary with Vocabularies of Buddhist Terms, 2nd, 1888*）的作者艾德（Rev. Johann Eitel）任編輯。至 1901 年 6-7 月號（第 25 卷第 6 號）刊出後遂停刊。」²¹

關於《中國評論》的出版地點和時間，一直存在著不少誤解，筆者在這裏稍稍展開。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中有這樣一段話：「*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意譯為《遠東釋疑》），發刊於 1867 年，每季 1 冊，為當時在華學者偉烈亞力等所組織，泛論中國歷史宗教語言等及批評關於遠東之書籍，至 1872 年，易名 *China Review*，每兩月 1 冊，至 1920 年，又易名為 *The New China Review*，至 1923 年，又易名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原《中國科學美術雜誌》），每月 1 冊，由蘇

萬歲（C. Sowersy）編輯，美術方面，由福開森任之，甚有精采。」²²戈先生的這段話中錯誤頗多，筆者有專文探討，此不贅。但這段話傳達出的錯誤資訊卻是《中國評論》是屬於上海的刊物，²³受其影響，《上海市出版志》一書中的「大事記」1867 年條下載「創刊《遠東釋疑》（*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英文季刊，偉烈亞力等主持。1872 年改名 *China Review* 雙月刊，1920 年改名 *The New China Review*……。」²⁴實際上，《中國評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由香港的「德臣報印字館」、倫敦的“Trübner & Co”和「別發洋行」共同出版發行的，而別發洋行的總部位於上海，在香港等地設分部，²⁵所以可以推測該刊在香港出版的時候，可能也同時在上海、倫敦和新加坡等地發行。但絕不能據此而認為《中國評論》是上海的刊物。

《中國評論》的創刊時間基本沒有異議，為 1872 年。而對於其終刊時間，卻至少有三種說法：1901 年說、1903 年說以及至今仍在出版之說。終刊時間眾說紛紜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評論》似乎沒有「停刊告示」，缺乏直接材料，而各家所據的間接文獻又互有出入。而據筆者所見，可以大略推知第一種說法比較符合史實，作為漢學研究權威雜誌的《通報》，在 1902 年刊登了《中國評論》停刊的消息，大意如下：我們得知由別發洋行出版的刊物《中國評論》，於 1901 年刊出 25 卷第 6 期（6-7 月號）之後，暫告停刊。²⁶另外，貝德士（M. S Bates）在其所編著的《西方東方學報論文舉要》一書中也指出《中國評論》「1872 至 1873 年在香港創刊，刊至 25 卷（1900 至 1901 年）即停歇。」²⁷再如上述石田

20 筆者對《中日釋疑》和《中國評論》的作者群進行了統計，發現兩者的骨幹作者基本一致，主要有：艾德（E. J. Eitel）、梅輝立（W. F. Meyers）、漢斯（H. F. Hance）、包臘（E. C. Bowra）、費笠士（G. Phillips）等。

21 石田干之助，《歐米に於ける支那の研究》（東京：創元社，昭和十八年），頁 115-116。亦可參見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a l'Empire chinois*（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頁 2416。

22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頁 72-73。

23 因為這段話在《中國報學史》一書的第三章「外報創刊時期」的第一節「外國人報紙」之「英文報紙」的「上海」欄下。

24 《上海出版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頁 24。

25 別發洋行是近代西人在華經營的一個重要的出版機構，目前對它的研究還有限，不甚清楚其內部的運作情況。

26 “Publications Périodiques,” *T'oung Pao*, Serie II, 3 (1902): 346. 係筆者按大意譯出，或略有誤差。

27 貝德士，《西方東方學報論文舉要》（北京：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印行，1934），頁 4。

幹之助一書²⁸和庫壽齡(S. Couling)的《中國百科》²⁹均持這一觀點。

其他說法則不大可靠。如黃文江在“Hong Kong and Sino-Western Cultural Interaction: Ernest John Eitel and the China Review”一文中依據1903年香港藍皮書的統計，認為「中國評論的出版時間始於1872年，終於1903年。」³⁰黃先生的這個論斷目前來看不能成立，因為沒有其他旁證，在明顯與上述其他相關材料矛盾的情況之下，只能使人懷疑香港藍皮書記載的準確性。至於最後一種說法，顯然是錯誤的，但卻時常在國內的相關論著中見到，如《國外漢學史》一書就稱「中國評論，香港出版，雙月刊。自1876年創刊後一直在刊行。」³¹張弘的《中國文學在英國》³²和陳才智所整理的〈西文漢學研究期刊一覽〉亦持此說。這一錯誤判斷其實有點可笑，是沿襲依據翟理思(H. A. Giles)《中國文學史》的說法而來的。翟氏的《中國文學史》初版於1901年，而完稿之時自然要稍早些，也許還在1900年底，所以《中國評論》在1900年就刊登了下列消息：「翟理思教授告訴我們他關於中國文學歷史的作品，作為Goses所編輯的叢書中的一種，出版的相關事宜即將完成。」³⁴也因此翟理思在其書後的“Bibliographical Note”中說《中國評論》「至今仍在出版」³⁵是十分自然的。如果說《國外漢學史》

和《中國文學在英國》因為重述翟理思原書的說法而沒有加以說明，從而容易使人誤解，那麼陳才智的說法就只能說是錯誤了。第三種終刊說法之所以產生的一個客觀原因，可能在於以China Review命名的刊物過多，不同的時期在不同的地區時常出現，如至今香港還出版有名為China Review³⁶的雜誌，所以如果不細加探詢的話，極易將這些刊物混為一談，因而得出本文所談的《中國評論》始終未曾停刊，至今仍在發行的錯誤說法。

還有一個問題，若《中國評論》為始於1872年而終於1901年的雙月刊，那麼該刊的總數應為29卷174期，而考狄(H. Cordier)和石田干之助都說僅有25卷，還有學者認為「《中國評論》(又稱《遠東釋疑報》)，1872年在香港創刊，1901年終刊，共出25卷143期，為英美在華傳教士兼漢學家的漢學評論刊物。」³⁷產生這種矛盾的原因何在呢？實際上，《中國評論》從1872年7月創刊，至1890年5月，這近18年間，出版時間較為規律，每年1卷、每卷6期，共計18卷104期刊。從1890年下半年開始，《中國評論》的出版情況出現了一個「波動期」，該刊第19卷延後至1892年1月才出版了最後一期。據其1892年1月份的告示所言「《中國評論》上一卷的最後3期由於各種原因而推遲了出版的時間。這一期出齊了19卷，我們決定在今年(1892年)出版下

28 石田干之助，《歐米に於ける支那の研究》，頁116。另參石田干之助著、唐敬果譯，〈歐美關於中國學的諸雜誌〉，《學術界》1: 6 (1943-1944): 49。

29 see Samuel Couling, "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China Review*, Kelly & Walsh, 1917, p. 102.

30 Wong Man Kong, "Hong Kong and Sino-Western Cultural interaction: Ernest John Eitel and the China Review," 《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22。

31 何寅、徐光華，《國外漢學史》(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頁205。但該書將《中國文學史》第一版的出版時間誤寫為1910年。

32 張弘，《中國文學在英國》(廣州：花城出版社，1992)，頁73。

33 陳才智，〈西文漢學研究期刊一覽〉，<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ID=1498>，2006年1月15日。陳先生對《中國評論》的認識存在的另一處誤差在於他把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和創刊於1872年的 *China Review* 看作兩個刊物，其實是同一個刊物。

34 See *CRNQ* 25:3 (1900): 156.

35 "Bibliographical Note," see H. A.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29, p. 442. 筆者所用是該書的重印本，似乎未加任何改正。

36 該刊起初名為 *China Review*，1900年開始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至2001年將刊名改為 *The China Review*，仍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該刊是以英文為主，半年刊，主要內容涉及關於中國政治、國際關係、社會經濟等方面。

37 段懷清，〈理雅各《中國經典》翻譯緣起及體例考略〉，《浙江大學學報》2005.3: 95的第二個注釋。

一卷（20卷），這樣可以避免以前每卷的始終兩期都在年中的不便。我們將盡力在本年出齊全卷的6期。」³⁸ 編輯的願望並未實現，其後幾年變成了每兩年出1卷：依次為：20卷（1892-1893），21卷（1893-1894），22卷（1895-1896），23卷（1897-1898）。最後兩卷重又恢復到創刊初期的發行模式，1899年下半年至1900年上半年出版24卷、1900年下半年開始出25卷，至翌年6月出版此卷第6期後終刊。所以總計25卷，每卷6期，合為150期。

（三）《中國評論》的編輯

《中國評論》的編輯共有幾位？在職時間為多久？這兩個看似非常簡單的問題困惑了筆者相當長的時間，就是到了現在，仍然不能說得到了完滿的解決。

從前引石田干之助《歐米に於ける支那の研究》一書來看，《中國評論》有兩位主編：鄧尼斯（N. B. Dennys, 1840-1900）和艾德（E. J. Eitel, 1838-1908）。庫壽齡的《中國百科》也稱該刊在「1872年由鄧尼斯創刊於香港」，「第二任主編是艾德博士」，³⁹與前說保持一致。

1872年《中國評論》在香港創刊時，作為創始人的鄧尼斯成了該刊的第一位編輯，翻開該刊第1卷第1期的扉頁就可以看到這樣的字樣：「主編鄧尼斯，皇家亞洲文會會員、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員」。鄧尼斯任主編的時間大概止於1876年7月第4卷出版完畢時，具體原因尚不大清楚。但從鄧尼斯本人的經歷中，我們或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擔任《德臣報》和《中國評論》的編輯的同時，還

是香港市政廳博物館和圖書館創始人。1877年，鄧尼斯作為華僑「助理保護官」而前往新加坡。」⁴⁰可能是繁雜的其他事務結束了他作為《中國評論》編輯的這一角色。

關於艾德擔任《中國評論》主編的問題，黃文江認為「艾德是否直接接替了鄧尼斯的編輯職位仍然十分清楚，但可以肯定1878年艾德已經成為《中國評論》的主編。」⁴¹其實艾德擔任《中國評論》編輯的時間還是比較確定的，因為該刊第5卷（1876年7月至1877年6月）的扉頁上第一次出現了「主編：艾德，圖賓根大學博士」的字樣。聯繫到鄧尼斯的情況，應該可以比較肯定地說艾德是直接接替前者擔任編輯一職的。

至此為止，《中國評論》編輯的問題似乎已經得到了徹底解決，考狄、庫壽齡和石田幹之助等諸家之說幾乎完全一致。但艾德1897年就從香港政府退休，和他的妻子及四個孩子定居於澳大利亞的阿德萊德，並在阿德萊德大學開設德國語言和文學的課程，⁴²根本不可能再擔任《中國評論》的編輯。《中國評論》22卷第4期的一篇名為「編輯聲明」的文章也證明了這一點，該文稱「在本期的序文中表達對前任主編的感激之情是再合適不過的事情了，因為他已經離開了編輯的位置並不再遠東地區居住了」，而「這份《評論》的任何優點都離不開他的辛勞和認真」。⁴³可以肯定，《中國評論》的編輯至少應為三位，誰又是艾德的繼任者呢？筆者目前還沒有發現較為直接的資料。

另據《歐洲中國學》一書的說法，波乃耶（Ball, James Dyer）在「1900-1901年曾擔任《中國評論》（英文刊名為*The China Review*）雜誌的主筆。」⁴⁴原書此處

38 "Notice to Subscribers," see *CRNQ* 19: 6 (1892).

39 "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China Review*, p. 102.

40 *Nicolas B. Dennys and the Descriptive Dictionary*, p. 5.

41 Wong Man Kong, *Hong Kong and Sino-Western Cultural Interaction: Ernest John Eitel and the China Review*, p. 127.

42 G. B. Endacott, *Europe in China*, by E. J. Eitel, *The Man and the Book*, see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4 (1957-1958): 56.

43 Editorial Announcement, see *CRNQ* 22: 4 (1897): 619.

44 黃長著等，《歐洲中國學》（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5），頁275。波乃耶長期任職於香港殖民政府的最高法院，通曉中國許多地方的方言，對廣東話和客家話均有一定的研究，他在漢學方面的貢獻可參閱 Henri Cordier, Ball, J. D., see *T'ong Pao*, Series II, 19 (1919): 50-51. 考狄的這篇紀念文章比較簡短，中間未曾提及波乃耶與《中國評論》之間的關係。

沒有註釋，不知所據為何？筆者在這裏也只能存而不論。

(四)《中國評論》的作者群

《中國評論》的作者主要是在華的外僑，包括傳教士、外交官、海關職員和香港政府的公務員等，當然也包括少數歐洲本土的漢學家如德國的嘎伯冷茲（Gabelentz）和香港的華人如何啟（Ho Kai）博士。其中較為活躍的包括「翻譯中國經書的著名英國學者理雅各（J. Legge），在廣東設立『嘉約翰精神病收容所』的美國籍傳教士嘉約翰（J. G. Kerr），南洋史研究的開拓者、英國駐華領事費笠士，上述的俄國人貝勒（E. Bretschneider），英國的莊延齡（E. H. Parker），德國的艾德等，都是畢生從事中國研究的篤學之士。」⁴⁵

在所知的 125 位作者中，國籍可考者有 119 人，分布如下：英國 74 人、美國 18 人、德國 14 人、法國 3 人、奧匈帝國 2 人、荷蘭 2 人、瑞士 2 人、葡萄牙 1 人、丹麥 1 人、俄國 1 人、中國人 1 人，可見英國人佔據了人數上的絕對優勢。從職業來看，可考者 113 人，計有傳教士 36 人、外交官 34 人、海關人員 20 人、學者 9 人、香港殖民政府人員 8 人、商人 4 人、醫師 3 人、其餘有銀行職員和編輯以及記者各 1 人。但必須指出的是，該刊的作者大部分都是一身兼多任的人物，如第一任主編鄧尼斯，就有外交官、編輯和港府職員三重身分；而第二任主編艾德的情況也大致相同，既是傳教士和學者，同時又任職於香港殖民政府。筆者所採用的標準大致如下：每個人的身分只認定一種，那就是他本人在給《中國評論》投稿的那段時間裏的最主要的身分，按照這個標準，筆者將鄧尼斯的職業定位編輯，將理雅各的職業定為學者。

(五)《中國評論》的發行管道和地理範圍

《中國評論》的發行管道還沒有直接的材料可以說

明，只能依靠其他方面的線索來略加推測。第一個可資利用的是《中日釋疑》的發行網路，《中日釋疑》在不少地方設有代辦處，「訂閱者可以採用付費或者免費交流的方式」⁴⁶獲得該刊，具體地點包括：中國的汕頭、廈門、福州、上海，東南亞地區的馬尼拉，還包括澳大利亞、日本、倫敦和三藩市等國家和地區。⁴⁷考慮到《中日釋疑》和《中國評論》的密切關係，且兩者間斷的時間僅有一年半，所以可以推想後者也沿用了前者的發行管道。第二個可以憑藉的是「別發洋行」，李歐梵曾經指出，誠如別發洋行的「分支機構所顯示的，他們的書籍運送線把下列城市緊緊地聯繫了起來：上海、香港、天津、橫濱、新加坡、新德里和孟買。雖說這條運送線路很明顯帶著英殖民主義的印跡，這條城市鏈還是形成了一個國際文化空間，其中不僅英法的地位顯赫，日本也扮演著重要角色。」⁴⁸別發洋行一直是《中國評論》出版發行的機構之一，可以推想該刊的發行也利用了這條國際色彩極濃的「運輸線」。綜而論之，《中國評論》的發行範圍應該包括中國沿海的港口城市、東南亞地區、歐洲和新興的英語世界——美國和澳大利亞。

(六) 欄目設置和主要內容

該刊的主要篇幅是由專文組成的，包括論文、書評和翻譯三大類。在《中國評論》幾乎每一期都有的 To Contributors 中，編輯聲明「《中國評論》歡迎關於中國及其相關領域的稿件，所涉主題如下：1. 建築（古代和近代）；2. 土著民族；3. 農、工、商業；4. 考古；5. 藝術和科學；6. 傳記；7. 研究書目；8. 中亞民族、地理和歷史；9. 年代學；10. 朝鮮的歷史、語言、文學和政治；11. 工程著作；12. 人種學；13. 動、植物；14. 地理、自然和政治；15. 地質；16. 行會和商會；17. 歷史（通論和區域史）；18. 碑刻；19. 中外關係；20. 中國和日本在文學、宗教、哲學和文明方面的影響；21. 法律；22. 文學（古代和近代）；23. 風俗禮節和體育休閒；24. 神話；

45 《歐米に於ける支那の研究》，頁 116。

46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3: 5 (1869): 90.

47 參見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3: 5 (1869): 90.

48 李歐梵，〈上海的世界主義〉，《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328-329。

25. 醫學；26. 冶金和礦物；27. 錢幣；28. 政治機構及其治理；29. 宗教信仰和禮儀；30. 對有關東方著作的評論；31. 秘密會社；32. 商道；33. 原住民族的著作、小說和戲劇等等。這個略顯冗長和雜亂的啟示幾乎無所不包，表明了編輯的雄心。

此外該刊還設有「學界消息」欄目，主要是報導漢學界新近出版的論著和發表的文章，「這些著作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新書，而是指最近兩個月內出版的書」。⁴⁹

最後一個欄目是繼承自《中日釋疑》的「釋疑」，即通過提問和回答的方式來瞭解中國的事物。

按照創始人的設想，《中國評論》的研究範圍和內容包括「中國、日本、蒙古、西藏、東方列島和一般意義上的遠東地區的科藝、人種、神話、地理、歷史、文學、自然史、宗教等方面」。⁵⁰不過通觀整個期刊，中國以外地區的研究只有日本、朝鮮和東南亞，並且數量十分有限。這份刊物所發表的論文和雜纂，主要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中國的語言文字、文化和歷史。

1919年，《新中國評論》(*New China Review*)創刊，主編庫壽齡在〈前言〉中明確指出：「《中國叢報》開始於1832年，總共持續了20年，《中國評論》發行的時間是在1872-1901年間，它們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版過同類的刊物。今天最主要的漢學雜誌是《通報》(*T'ong Pao*)和《法蘭西遠東學院院刊》(*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 Extrême-Orient*，一般簡寫為B. E. F. E. O.)，兩者都具有極大的價值並共同維持了法國在這門科學中的領導地位。」但是，「由於它們所使用的主要是法語，對於人數眾多的講英語的學生來說顯得用處不大。並且，中國研究只是他們所關注問題的一部分。」⁵¹鑒於此，他認為「如果想要恢復和保持我們在漢學研究中的地位，我們就應該恢復使用英語的《評論》，並且這樣

的《評論》要在有大量研究中國事務學生的中國國內發行。」庫壽齡親切地稱《中國評論》為「老評論」，說「雖然理雅各、金斯密(T. W. Kingsmill)、艾德、湛約翰(J. Chalmers)、艾約瑟(J. Edkins)都不在了」，但是「翟理思(H. A. Giles)和莊延齡這兩位老《中國評論》的積極參與者還和我們在一起，他們會幫助《新中國評論》變得更有價值」。⁵²顯然，庫壽齡是把《中國評論》視為英國漢學的代表性刊物的。

三、《中國評論》與19世紀英國漢學之發展

與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等國家相比，英國人對中國的研究起步較晚，「17和18世紀英國的中國研究可稱之為前漢學階段，那個時期英國人對中國的興趣還是人文主義的，不屬於文獻學和實際意義上的漢學研究」。⁵³不過，到了「19世紀，隨著中英兩國外交關係的建立，英國對中國的這種人文主義的興趣起了新的變化。1793年來華的馬嘎爾尼使團和1816年來華的阿美士德使團驚醒了一些公務員、傳教士和商人，這些人由於職業的需要開始對中國進行專門的研究並成為這一領域的中流砥柱。文人學士業餘休閒式的中國研究開始讓位於專業的漢學家，他們之中如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和理雅各(James Legge)等，在撰寫宗教著述、商務指南、藍皮書和海關報告的閒暇時間裏編輯字典、翻譯中國文獻，從而使漢學從文學中脫離出來」。⁵⁴

但學者對19世紀英國漢學的評價卻頗為不一。第

49 *CRNQ* 1: 1 (1872): 58.

50 Introductory, see *CRNQ* 1: 1 (1872): 1.

51 Editor's Foreword, *New China Review* 1: 1 (1919): 1.

52 Editor's Foreword, p. 2.

53 錢鐘書，「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錢鐘書英文文集》(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頁83。

54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p. 84。

一種較為普遍，認為這個時期的英國漢學遠遠落後於法、德等國家，如英國學者巴雷特（T. H. Barrett）在其所著《出奇的冷漠》⁵⁵一書中「繼承了二十年前崔瑞德教授的觀點，對英國的中國學作了非常嚴厲的批評。他從16世紀伊比利亞半島的中國學開始，將荷蘭、法國、德國、俄國及北歐、美國也納入視野加以比較，考察各個時代對中國書的收集和中國研究的狀況，結論是，在全世界中國學的範圍內，英國並沒有做出應有的成績。」⁵⁶第二種看法與此針鋒相對，如闕維民先生指出「從16世紀至1924年，西方漢學家共有7,737位，其中113位至少發表或出版了20篇（部）以上的論文（著作）。筆者稱他們為多產西方漢學家，其中英國為37人，法國29人，德國12人，美國9人，其他國家7人，不明國籍者19人。而在37位英國高產漢學家中，僅有兩位逝世在1850年之前、6位逝世於1925年之後，他們在華期間和漢學研究最佳年齡階段在19世紀的佔大多數。這一事實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說明，19世紀的英國漢學研究隊伍，已經成為左右西方漢學研究的主導力量之一」⁵⁷美國里海大學（Lehigh College）的吉瑞德教授（N. J. Girardot）也認為：「到了1870年代，英美世界的漢學研究開始從『出奇的冷漠』的業餘漢學階段向自覺的、科學的、作為東方學分支的專業漢學轉變，主導這一過程的是那些在中國從事宗教、政治和商業事業的『紳士學者』。《中國評論》這份在英國殖民地香港出版的刊物見證了這一變革。《中國評論》和其他諸如《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報》、《教務雜誌》等英文期刊的傑出學者共同推進了英國漢學在世紀末的巨大進步。」⁵⁸

筆者以為，前述關於英國漢學的評價出現巨大反差的原因在於他們考察的地理範圍不同。「批評派」大都

是僅僅考察英國本土漢學的基本情況，沒有充分重視英國漢學在「域外」的發展。而持正面評價態度的學者則或者如吉瑞德教授那樣研究了《中國評論》等期刊，或者所依據的材料比較全面，以闕維民為例，他的統計資料來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為考狄《西人論中國書目》所編的索引。⁵⁹眾所周知，考狄雖然是法國人，但卻對英國漢學有著至為淵博的知識，被譽為「在法國和英國傳統之間的一座活著的橋樑」。⁶⁰考狄所編纂的《西人論中國書目》，第2版共有5卷、4,439頁，在收錄1924年前西方人漢學研究的著述方面可謂巨細無遺，不僅包括了全部前文所討論的刊物，還著錄了眾多其他涉及中國研究的刊物，如西人在朝鮮出版的《朝鮮評論》（*Korean Review*, 1892-1901）⁶¹等。闕維民在考狄《西人論中國書目》的基礎上所得出的資料，自然包括了英國漢學本土與「域外」的兩翼，故其結論也較為客觀。

如此看來，認識和評價《中國評論》倒成了看待19世紀英國漢學的關鍵所在了。筆者以為，《中國評論》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了值得注意的成績。

（一）文獻範圍的擴展和研究方法的創新

《中國評論》繼承了法國漢學所開創的文獻研究法，大量利用中國文獻來研究中國。加上該刊的作者大都有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居住於中國的經歷，使得他們在材料利用和研究方法上均有所突破，如嘉約翰（J. G. Kerr）在《中國評論》上所發表的〈廣州固有的慈善設施〉⁶²一文，「在介紹育嬰堂等官營設施的時候，他利用了《廣東志》（乾隆三年（1738））來追尋它的歷史，而且親自前往育嬰堂、老人堂、普濟院進行實地調查，有時還嘗試著向設施的管理者提

55 T. H. Barrett, *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Well Sweep Press, 1989.

56 近藤成一著、王瑞來譯，〈英國的中國學〉，《漢學研究通訊》12: 4（1993）：247。

57 闕維民，〈劍橋漢學的形成與發展〉，《漢學研究通訊》21: 1（2002）：33。

58 N. J. Girardot, "Finding the Way: James Legge and the Victorian Invention of Taoism," see *Religion* 29 (1999): 107-121 (<http://www.idealibrary.com>), 2005.12.11.

59 同註66，頁32-33。

60 N. J. Girardot,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144.

61 參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a l'Empire chinois*, pp. 2989-2999.

62 J. G. Kerr, "The Native Benevolent Institutions of Canton," see *China Review*, 2: 2 (1873) and 3: 2 (1874).

問。……在介紹愛育善堂實際經營狀況的時候，他使用了該善堂發行的同治十一年（1872）和同治十二年（1873）的兩冊報告書。……如果聯想到該善堂一直持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1954年被廣州市公益社團聯合會接受為止，那麼就有必要說明嘉約翰的研究是無比珍貴的。」⁶³此外，《中國評論》的研究還引進了近代西方所發展起來語言學、語音學、神話學、人類學、歷史比較法等學科和研究方法。如艾約瑟（J. Edkins）就認為應該使「葆普（Bopp）和格裏木（Grimm）所發明而又經過謬勒教授發展的定律，成為漢語研究領域的指南。」⁶⁴最重要的是要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比較語法並著重比較語言之間的親屬關係」。⁶⁵基於此，艾約瑟在《中國評論》上發表了二十餘篇研究漢語的論文，討論了漢語的一些基本問題尤其是漢語同阿卡德語等語言之間的關係。此外，鄧尼斯則採用了謬勒教授和格林兄弟「為其後繼者所鋪就的」⁶⁶比較神話學的方法對中國和雅利安種族的神話傳說進行了比較研究，被認為是「一種跨越種族和文化的探索，預示著比較研究的廣闊前景。」⁶⁷當然，艾約瑟和鄧尼斯的上述研究還完全籠罩在歐洲學術的陰影之下，未能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艾約瑟的研究即受到了來自德國的學者福蘭閣（O. Franke）的批評，在福蘭閣看來，艾約瑟在做漢語比較研究時，不管是死語言，還是活語言，他都能從中找到其與漢語的親緣關係。福蘭閣對這種研究方法頗有批評，他在香港出版的《中國評論》上發表〈中國和比較語言學〉（China and Comparative Philology），對這種觀點和方法提出了商榷。「據說該刊編輯艾德對於

福蘭閣加入討論，澄清真相，表示了熱情的歡迎。」⁶⁸儘管如此，艾約瑟等學者引進西方理論研究中國語言和文化的做法，在學術史上還是有其重要意義的。

（二）專業漢學刊物的出現和學術自覺的持續加強

《中國評論》是目前所知「西方世界最早真正漢學期刊。它們至少是最早完全關注中國的期刊，與此同時它們也自我意識到自己所擔當的科學任務。」⁶⁹另外，該刊表現出了一種明顯的學術自覺：即開始批判漢學研究的狀況並思考關於漢學的一般問題。1873年艾德在《中國評論》第1卷第4期發表了享譽盛名的評論文章〈業餘漢學家〉，他批評說，在時下的漢學研究中，可以觀察到一股暗流，類似某種慢性或間歇性精神疾病。「這種『流行病』的主要『症狀』，我們可以稱之為『業餘漢學家』。他們熱衷於在科學的『幌子』下依據一些事實建立起無所不包的『戒律』，這中間充滿了臆測和武斷，瀰漫著他們處理材料時的不分青紅皂白，還要加上對經原始文獻的膚淺解讀、無視經典『微言』的傲慢和批判精神的徹底泯滅。」⁷⁰這樣的著作當然毫無學術價值可言。那麼漢學應該往何處去呢？怎樣才能深入地研究中國呢？艾德認為首先「我們在接觸中國文獻時應該有一個明確的觀念，就是我們的未知領域還很廣泛，任何個人都不可能憑一己之力掌握全部內容。因此我們每個人都應該選取一個分支，進行專門的研究。」⁷¹更進一步，「我們應該以原始材料為基礎，當然也包括諸如注疏、傳記和百科全書這樣的二手材料，並利用哲學思維歷史地、思辨地核對總和批評這些材料。不對任何東

63 夫馬進著，吳躍譯，《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2005），頁6-7。

64 J. Edkins, "Chinese Philology," see *China Review* 1: 3 (1872): 183。這段引文中的Bopp和Grimm指的是著有《論梵語動詞變位元系統》的德國語言學家葆普和著有《德語語法》的語言學家雅各·格裏木。

65 *Chinese Philology*, p. 183.

66 N. B. Dennys, "The Folklore of China," see *China Review* 3: 5 (1875): 269.

67 周發祥，〈西方的中國神話研究〉，見《漢學研究》4（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171。

68 張國剛，《從外教譯員到漢學教授——德國漢學家福蘭閣傳》，《國際漢學漫步（下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頁849。福蘭閣的文章發表在《中國評論》20: 5 (1893)。

69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p. 145.

70 E. J. Eitel, "Amateur Sinology," see *China Review*, 1: 4 (1873): 1.

71 *Amateur Sinology*, p. 5.

西想當然，也不依賴於潮流和傳統的力量，而是嚴格地檢驗那些被稱為確鑿和古典的事物的真實性，公正地就事論事，就像我們坐在檢驗法庭的凳子上一樣。」⁷²艾德還舉儒家研究為例，「要達到對儒家的科學認識，我們需要明瞭孔子出生前的文學、政治和文明狀況，需要區別孔子原初的哲學體系和後來他自己傳授的那套經過系統化的學說。我們更要進而知道孔子在當代哲學家心目中的位置，瞭解他們對孔子學說的遵從或修正，並最終洞察儒教自孟子至毛西河或正統或異端的各派各宗。」⁷³《中國評論》甚至出現了以「漢學是一門科學嗎」為題目的討論文章，作者問道「漢學是一門科學嗎？像其他學科一樣？還是如『顛相學』一樣建立在臆測的基礎上，仍舊是不確定知識的混合體？」⁷⁴這樣的問題雖非一篇論文所能解決，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評論》同仁對漢學的深入思考。而作為《中國評論》的後繼者，《新中國評論》的自覺性更強，前引庫壽齡的話已經表明，其創刊「新評論」就是要為英國漢學爭取其應有的地位。

（三）新領域的開拓

《中國評論》為代表的英國「域外」漢學的成就，還包括該刊對漢學研究新領域的開拓。梅輝立（W. F. Meyers）的〈15世紀中國人在印度洋的探險〉一文，⁷⁵本為翻譯和考釋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一書〈自序〉至上卷「爪哇國第三」之間的内容，但因其中涉及鄭和，且考證詳實，遂成為西方鄭和研究之始。伯希和在《鄭和下西洋考》中敘述學術史時也首舉「邁耶斯（Mayers）

在《中國雜誌》（China Review）第3冊（1874-1875年刊）同第4冊（1875-1876年刊）中之研究」，⁷⁶可見梅輝立在鄭和研究上的首倡之功。又該刊所載艾德的《客家歷史綱要》和畢安（C. Piton）的《客家源流與歷史》⁷⁷是中外學術界關於該領域的最早的研究成果之一，分別利用族譜和口頭採訪所得到的材料，從移民史的角度對客家的歷史進行了探討。他們的研究不僅引起國際漢學界對客家研究的重視，還影響到了我國被稱為客家研究權威的著名學者羅香林。⁷⁸而在艾德和畢安之前西方人關於客家的作品僅有梅輝立對「廣東土客大械鬥」的記載，很難稱得上是研究，所以說《中國評論》的研究可以說是開了國際漢學界該領域研究的先河。⁷⁹再如艾德的香港史研究，在《中國評論》刊出後不久即由別發洋行出版，作者「見證了許多他所敘述的事件並擁有直接的認知。因為長期居住於香港、作為一名殖民政府官員的他更容易理解所發生的事件。」⁸⁰更為重要的是艾德所利用的一些資料「已經消失了，且可能是永遠消失了」，因為「在日本佔領香港期間，許多檔案和政府通信由於戰亂、掠奪、忽視和惡意破壞而化為烏有。」⁸¹從而使該書成為最早的香港史研究的經典著作之一。

美國學者韓大偉（D. B. Honey）曾經從文獻學的角度將西方古典漢學史分為三個階段：「耶穌會士階段」、「法國漢學學派時期」和「英美學派時期」。⁸²法國漢學學派的代表包括了雷慕沙（A. Rémusat）和儒蓮（S. Julien）等在內的著名學者，他們「首次發展了一套複雜的技術方法，不僅用於通過閱讀使用文獻，而且更重要

72 *Amateur Sinology*, p.5.

73 *Amateur Sinology*, p.6.

74 J. C. "Is Sinology A Science?" see *China Review* 2: 3 (1873): 169.

75 W. F. Meyers, *Chinese Explorations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 3: 4-6 (1875); 4: 2-3 (1875).

76 伯希和著、馮承鈞譯，《鄭和下西洋考 交廣印度兩道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11。

77 E. J. Eitel, "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Hakkas," see *China Review* 2: 3 (1873) and C. Piton, "On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Hakkas," see *China Review* 2: 4 (1874).

78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頁4。

79 可參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p. 369.

80 "Introduction," see E.J.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

81 "Introduction," see E.J.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p. 2.

82 參美國學者韓大偉，〈傳統與尋真——西方古典漢學史回顧〉，《世界漢學》3(2005): 7。

的是在文本傳統之中批判地評估文獻的價值及地位，並且大膽地提出獨自的解釋。」不過，這派學者「很少來自於中國注釋傳統的借鑒」，並「受制於歐洲圖書館有限的原始資料」。他們中的佼佼者為儒蓮，「他不僅從未到過中國」，還以「從未利用過中文原文資料而自傲」。⁸³

「法國漢學學派時期」大約從 18 和 19 世紀之交開始，一直延續到了 19 世紀的 60 年代末，這一時期西方漢學界呈現出的是一幅法國漢學獨步天下的歷史圖景。

但是，「英美學派」尤其是英國漢學的崛起打破了前述西方漢學研究的地理格局。「英美學派時期」的漢學家「最初運用了尚且幼稚的考古學、碑銘學、民族學、人類學、民俗學學科方法的田野工作剛剛起步。在居住於中國的兼職漢學家們當中，理雅各是最有影響的傑出人物。繼儒蓮之後成為漢學家中大師級的人物，他在 1876 年坐上了牛津大學漢學研究首席的交椅，由此確立了英美漢學相對於法國漢學的優勢地位。」⁸⁴ 理雅各的主要工作是翻譯《中國經典》，所以說他在牛津的位置對於英國漢學來說象徵性的意義更大一點，在一定程度上也僅至於此。真正運用韓大偉所說的引進西方學術的新方法從事漢學研究並開始所謂的「田野工作」的，應該說是《中國評論》。關於這一點，筆者在前文中實際上已經做了足夠的交代：艾約瑟的漢語研究以及鄧尼斯的中國神話研究屬於前一類，而嘉約翰在研究中訪問當事人、搜求徵信錄和利用碑文資料則屬於第二類。特別是第二點，可謂《中國評論》這一在中國本土出版的刊物的最獨特之處，身處中國的優勢使他們不僅在語言學習上，在對中國的理解上，還在資料搜求和研究領域

上實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突破，所有這些都是困居於書齋的「法國學派」學者所難以想像的。所以說，19 世紀最後 30 年英國漢學的代表應該有兩個：理雅各和《中國評論》，他們共同見證了英國漢學「驚人的一躍」，促使英國漢學對法國漢學實現了暫時性的超越，從而改變了 19 世紀末期西方漢學研究的地理格局。

四、結語

費正清在描述其博士論文答辯的情形時說：「我已經學會了如何成為歷史學家中的漢學家，以及稍加變化，又成為漢學家中的歷史學家。很像一個不易被抓住的中國土匪，處在兩省轄地的邊緣，一邊來抓便逃到另一邊。我通過了答辯。」⁸⁵ 《中國評論》可謂處於中西學術界「轄地的邊緣」，在西方學者看來，該刊物出版於中國，且是標準的專門研究中國的期刊；而在中國學者的視野中，其又是來華外國僑民所經營的外文出版物。結果，《中國評論》幾乎被歷史的塵埃徹底淹沒。然而，在全面看待近代英國漢學，尤其是充分考慮英國漢學在遠東之發展的新視野下，這些在幽暗斗室之中且早已泛黃的外文舊籍，瞬間之下顯得熠熠生輝，展示著英國漢學「本土」與「域外」的兩翼齊飛的地理格局以及英國漢學在近代的整體崛起。理雅各和《中國評論》所代表的 19 世紀最後 30 年英國漢學在整個西方漢學界的領先地位及其對於整個西方漢學研究格局的影響，真可改變關於英國漢學的固有偏見。先賢有言，橫看成嶺側成峰，信哉斯言！

83 同上註。

84 同上註。

85 費正清 (J. K. Fairbank) 著、黎鳴等譯，《費正清自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頁 170。